

梁漱溟在反右运动中

作者：马勇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11-18

常言道：说有容易说无难。历史学最忌讳的就是往往凭借有限阅读或一己之见大胆放言“从来没有”之类的绝对言辞，这些信誓旦旦的断言往往被一个很小的发现予以证伪，令人难堪。比如在梁漱溟研究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说梁漱溟接受1953年与毛泽东发生冲突的教训，没有再说一句话，因此他没有像那些老朋友如陈铭枢等人那样被划为右派，沉默换来了平安。

这个说法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然而却不是历史真实，因为研究者说到底还是阅读有限，没有穷尽史料。真实情形是，梁漱溟与毛泽东当面冲突后，确实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政坛淡出，不过不知来自哪个方面的原因，梁漱溟在并没有因这件事情受到什么处分，各种各样的会议通知照样发给他，只是梁漱溟的心情不太好，尽量少的参加会议和活动，尽量不发言不表态，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梁漱溟转而对现实政治持冷漠态度。

恰恰相反，正如中国老话说的那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梁漱溟仍在冷眼旁观中国政治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遇到值得高兴的事情忍不住惊喜，遇到弄不清的问题则暗自疑惑。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梁漱溟和往常一样，在开始并没有对大会表现出多大兴趣，但由于大会内容太引人注目，慢慢刺激了梁漱溟的注意力。中共八大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变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八大的这个结论很明显是对阶级斗争学说的修正，而这一点正与梁漱溟的素来见解相契合，尽管中共以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了新中国，使梁漱溟在阶级斗争问题有所觉醒，但他仍很难相信在和平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必须依靠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八大的结论使梁漱溟这些不清晰的认识归于清晰，他由衷敬佩中共政治领导的高瞻远瞩和不凡气度。

正当梁漱溟沉浸在中共废止阶级斗争理论的喜悦中，毛泽东鉴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新问题又在改变先前已确定的方针。1957年初，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反复号召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大字报，热闹非凡，目不暇接，一时间又使梁漱溟感到困惑不解。

不过，梁漱溟这次再也不愿把自己的困惑不解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了，在他没有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真实情形前，他决定不参加鸣放，不发表意见。有老朋友上门劝他也不妨说几句，好几位新闻记者找他采访，要求他谈谈感想，一吐为快。梁漱溟统统婉言谢绝，一言不发，他决心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和局外人，静观事态的发展。这大概就是后来许多研究者所认定的梁漱溟在反右运动中一言不发的史料依据。

大鸣大放在起初阶段并没有唤起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兴趣，先前短短几年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已经使这些新时代的旧人物成为惊弓之鸟，对于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是能躲就躲，洁身自好，明哲保身，实在不愿参与这些不知结果的政治运动。

毛泽东和中共领袖们究竟要通过大鸣大放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人们并不清楚，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的部分沉默并不能改变毛泽东的既定决策，更何况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有人沉默，也有人积极。于是这些积极的人继续忽悠，很快就显得热热闹闹，于是许多不明真相的人终于耐不住寂寞，终于在各方面的迫切要求下参加鸣放。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梁漱溟接受了《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记者杨重野的访谈，两个人整整谈了一个下午。

记者一开头就问梁漱溟近来为什么很少讲话。

梁漱溟说：“最近常有朋友来找我，也问我为什么不说话，好像我怀着意见不发言似的。”他说：“我不是不肯说话，也不是有意见不提，我对于领导党在整风中的作法——广开言路，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向领导党提意见，非常感动，油然而起一种敬佩的心，话好像都没有了。”他说，在报刊上读到很多人的发言和写的文章，其中有不少中肯的意见，如以党代政、有权无权问题等，应该说的，好像都说了，不必再去重复。他又说，他自己没有参加任何一项工作，也不在任何一种团体组织，“我是在一切的外面，四下不着边际，自己没有接触到实际问题。有些问题也只听人家这么说那么说，而自己没有亲身的感受。自己没有感受，认识就不真，很可以不必说。”

“那么，你可不可以就以党代政问题和有权无权问题谈谈你个人的意见呢？”记者问。

“可以”。梁漱溟说，“这个问题别人已经谈过了，既然你提出来了，我就谈一谈。”梁漱溟说：“党是领导人民群众建设国家的，党的作用在于领导，领导的含义是丰富的、深厚的。党应该把自己放在人民中间，领导可以采取各式各样的方式，但是毋须用命令的方式。命令是有强制性的，只有国家才能这样做。国家之所以为国家，就在于它有强制力，将来共产主义建成了，国家消亡，强制力也就消亡了。”

“党是要抓住国家这个机器的，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政权。但是党与国家的分际要搞清楚。党的决定只是党内的决定，党所制定的方案只能是草案。党的决定和方案，必须通过国家机关——如人民代表大会或国务院，才能成为法律和政令，才能发生强制的效力。”

梁漱溟认为，这个问题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但是，所谓通过国家机关，不单是形式的通过，走个过场，需要认真的讨论。这样有权无权的问题就不会发生。非党人员的部长没有参加部务的讨论的事也就不会有了。

接着，梁漱溟谈到“以党代政”的危害性。他说：“问题很显然，优秀的人才和宝贵的意见不可能都集中在党内。党应当听取大家的意见，让优秀的人才发挥作用。”

梁漱溟说：“说一句谅解的话，这只是领导党的粗疏，党政分际未搞清。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并不因为你是粗疏，或则是无心之过而减轻。”他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由这个问题梁漱溟谈起他对中共号召整风的感想。他认为整风在这个时候提出是适时的，如果不是国内形势发展：阶级矛盾退后，人民内部矛盾提上来，还不可能这样做。他认为整风是很必要的，否则，像以党代政问题就没人敢提，很多错误就不会有纠正的机会，那就会给国家造成莫大的损失。

接着梁漱溟谈起他最近的思想变化。他说：“当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时，我很赞赏，觉得共产党又作了一样漂亮的事。真的，如果不是这样开放，学术思想就不能繁荣，科学就不能深入。科学这东西必须扎下根，才能生长，开花。这个政策是了不起的。”

“但是，整风运动一开始，我的心里感受就不同了，我不是在赞赏，而是深深地感动了。你想，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人作了多少好事情，现在它都丢开不提，只觉得自己有缺点，要人家给他提意见。这种襟怀，这种作风就把一切问题都化小了，我相信任何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梁漱溟表示他过去认为国事茫无头绪，甚至有无指望也不敢说，只觉得中国问题太大、太多。后来是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主席把国家引进了康庄大道。今天，任何人都看到中国这个国家蒸蒸日上的前途，任何人都要敬佩、心折。

他说：“我实在感到毛泽东主席好，他英明、大胆，能够不放过任何时机，争取主动。他造福了我们的国家，避免了人民的损失，我——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他的声音颤抖了，眼圈红了，他在抑制自己的感情，但是终于潸然泪下。

梁漱溟与《文汇报》记者相对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说：“正逢是领导党所采取的重大步骤。通过整风，我们希望党政之间的关系能有所调整，但是决不想削弱党的领导，如果经过整风削弱了党的领导，那就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因此，领导党的开放言论彻底，要尽量地开放；而说话的人必须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实事求是，不要把许多问题过于夸张，不要把枝枝节节的问题也兜上来，那样就不大好，如果再带点发泄的情绪就更没味道了。”

梁漱溟认为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所谓“三害”不可能从社会上断绝，只要你作事顺手，稍微自满一下，毛病就会出来。要减少“三害”，唯一的道路只有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因此必须搞好党群的关系，党员不要自居于特殊化，高人一等。这种特殊正是党群关系搞不好的障碍，要把这个障碍搬开。

在人们的印象中，梁漱溟自1953年之后就开始沉默了，不愿就国事发表意见了。梁漱溟对此不愿承认，他对《文汇报》记者说：“我只是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可说，该说的还是要说。几年来我到各地视察，如1955年去甘肃，1956年去安徽，最近去广西，我都写了视察报告交给人大常委办公厅，报告中有批评，有建议，只是没见诸报端而已。”

接着，梁漱溟向记者谈起他最近在广西视察中接触到的一个问题。他们视察小组一共收到了六封信，其中五封是在“劳动教养”的人或他们的家书写来的。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过错也不大，因此是“劳动教养”而不是“劳动改造”。但是“教养”一年多了，还没有放出来。他说：“毛主席宣布过，要对肃反运动进行全面检查。这件事是否正在做，我不知道。我希望该放的放，该恢复名誉的恢复名誉，失掉工作的该给找工作。总之，要做个全面交代才好。”

在这段谈话以后，《文汇报》的记者还没有提出新的问题，梁漱溟却先发言了。他说：“至于在学术争鸣上也有人怪我没说话，方才我们谈了个头，现在我也想谈一说。”

接着，梁漱溟很谦虚地说：“我一向认为自己不是研究学问的人，过去几十年来我常这样说：“我只是对任何问题都爱有自己的见解。”

梁漱溟还说：“至于说到我的喜好，我很喜欢东方的——印度和中国的几种学问，这些都是古旧的东西。自从近代学术发达起来以后，这些古代东方的东西在学术上失去了地位，不仅失去了地位，而且不大为有近代科学修养的人所了解。”

梁漱溟认为这两种学问总有一天会沟通起来，不过不是短时间内的事。他自己愿意在这方面作点工作，为这两种学问搭起桥来。

谈到近期工作，梁漱溟告诉记者，他正在酝酿写两本书：一本是《东方学术概观》，一本是《人心与人生》。他为了写这两本书曾专门研究了一年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学说。不过目前只有腹稿，掌握了一些材料，还没有正式动笔，不过梁漱溟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把自己剩余的生命都贡献给这项工作。

梁漱溟访谈最后告诉《文汇报》记者说：“如果有人问起在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中我将作些什么，这就是我的答复。”

正像毛泽东当年所说的那样，事情正在起变化。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原本并没有多少人对大鸣大放感兴趣，然而经不起那么多积极分子起哄架秧子，于是群起大鸣大放大字报，点名批评共产党，批评毛泽东，甚至要求轮流坐庄，要求共产党下台，要求政党轮替。于是毛泽东把先前真诚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说成是引蛇出洞，反手发动反右运动，梁漱溟的老朋友陈铭枢、章伯钧、储安平等人相继沦为右派。

不在任何党派的梁漱溟，除了接受过《文汇报》记者访谈谈了一些看法外，在大鸣大放最激烈的日子里，似乎也没有更多地参与起哄，所以他在急风骤雨式反右运动中侥幸过关，没有像他的那些友人沦为贱民。这当然得益于他在1953年事件后变得小心谨慎，当并不意味着他在大鸣大放期间就真的没话说。

梁漱溟与《文汇报》记者杨重野的谈话发表在1957年印制出版的《批判文汇报的参考资料》第三辑上，编辑单位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杨重野是《文汇报》的老报人，原名杨葵，浙江人，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后投笔从戎，随远征军入缅作战，后加入《文汇报》，1948年离开国统区前往解放区，后在新华社北平分社当记者。《文汇报》1956年副刊后，杨重野作为老人被浦熙修召回《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当记者，在此后一年时间里，介入一系列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大事件，既采访马寅初谈人口问题，又采访梁漱溟谈党政分开，更重要的是，在大鸣大放的日子

里，他还以《文汇报》记者的身份在新闻界座谈会上发言，抱怨缺少新闻自由，这也构成毛泽东后来的愤怒，强调“《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杨重野遂被打成右派。

梁漱溟接受杨重野采访谈党政分开等问题，我在多年前出版的相关著作中就已提及，但一直没有得到研究者的注意，新近出版的一些有关梁漱溟的著作依然旧调重弹，强调梁漱溟在大鸣大放中一言不发，侥幸过关。鉴于此，详细介绍梁漱溟在1957年的政治活动特别是这次重要访谈，可能还是有点意义的。

原载《理论视野》2009年第10期。

文章录入：mayong 责任编辑：huangcs

- 上一篇文章： “轻浮急躁 擅自独断”：蒋介石在日记中如何反省
- 下一篇文章：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与美国政府的反应——兼论光绪死因

[【发表评论】](#) [【加入收藏】](#)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传真：65133283